



□ 焦晶娟

近日，一网友在个人社交媒体账号发布登山视频，因背包和上衣吊牌未摘被网友揣测是“恶意退货者”，意外遭受网暴，一些私信和评论攻击这位女士的面容、家乡，称其为“吊牌女”“吊牌战士”。

为了自证，该网友出示了购买记录，解释背包是今年9月买的，早就过了退货期限，漏摘了一个吊牌。衣服是2023年买的，吊牌附有寻亲的公益广告，觉得挺有意义才没摘。新的质疑声又响起来，有人说她蹭流量，“有什么好解释的”；有人用“个人常识”反驳，“谁家衣服两年不洗”。看到这位女士拍下的寻亲吊牌内容，又有人评论，“失踪时间2021年，现在2025年，这个照片有什么用”。

电商普及的今天，一些故意不摘吊牌“蹭穿”继而退货的行为确实给商家和其他消费者带来损失，这种“薅羊毛”行为应该批评。一个曾经质疑过“吊牌女”的人写道：“我开了100枪，其中有一枪不小心误伤了一个人，但是我觉得这是值得的。”“开枪”这一比喻，令人背后一凉。他很清楚自己的“评论”正在伤害别人，

## 事件观

但这种守护所谓“正义”的方式，真的“正义”吗？

综观近年来发生在普通人身上的网暴事件，领头的一些人会把具体的人抽象成一个“道德失范”的“靶子”，剥离事件具体语境、去掉前因后果，再“添油加醋”一些个人想象，以便达到所谓“伸张正义”的效果。于是染了粉红色头发的郑灵华被贴上“陪酒女”“摆拍”的标签；武汉一小学生在校内遭遇交通事故后，母亲因妆容精致，被说成“没有失去孩子的悲伤”。

正义不是粉饰强权的装饰品，也不是发泄情绪的工具。“惩恶扬善”这一朴素的正义观的问题在于，误认为事物的属性是静止不变的，正义就是让好的更好、恶有恶报。那么谁来定义“善”与“恶”？在这背后，是否隐藏着“强者就是正义”的“丛林逻辑”？

一些人口中所谓的“正义”，常常脱离了事件本身，成为一个为受害者精心设计的、让他们无法自证的陷阱。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一些极端的“键盘侠”行为与自恋、精神变态、虐待狂等人格倾向有关。

性格偏执的人终究是人群中的少数。那么“道德审判陷阱”，为何能引发更多普通人的跟风呢？另一项来自斯坦福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的研究，统计了新闻论坛2600万条发帖，发现样本里四分之一的“恶评”来自从未发布过此类内容的用户，而负面情绪和论坛里不友善的氛围会显著增加这些用户发表恶评实施网暴的概率。

法学教授罗翔认为，人们容易对他人进行道德谴责的原因是，“这能够满足我们想象中的道德优越，甚至可以掩盖我们事实上的道德败坏”。

更多时候，我们对于新闻当事人的想

象，正是我们自身困境的投射。需要明确区分的是，当我们批评“特权”时，我们是追求“公平”，还是因为“享受特权的不是我”；当我们指责“吊牌姐”，是真的在帮商家挽回损失，还是觉得相比于“羊毛党”，自己消费能力更强。

网络舆论的珍贵之处在于，作为社情民意的“实时晴雨表”，它让更多普通民众拥有了便捷的表达途径。无论是“油罐车”事件中对食品安全底线的维护，还是广西“亮证威胁”风波中对滥用公权力的质疑，面对社会公共事务，网络舆论的理性监督搭建起群众与治理者之间的沟通桥梁。

要警惕的是，网络表达的匿名性和即时性，也让极端表达的传播变得成本低廉。基于算法的信息推送机制，让这些能引发强烈情绪反应的极端意见有了更多曝光机会。“恐惧”“悲伤”“愤怒”更容易驱动群体共情，也更容易构成谣言和八卦

滋生的土壤。

社交媒体不断模糊着公共讨论和私人话题的界限，当网友习惯用放大镜去审视私德，“道德围猎”的目标正从公众人物延伸至普通人。网络对个体经历的放大，时常会让人们陷入“零和博弈”的陷阱，仿佛远方一个陌生人微小的“瑕疵”，就会影响到屏幕外我们的现实利益，仿佛只有攻击这个瑕疵才是“正义”的。

但这种“正义”并无实际意义，即使我们通过辱骂一位顾客，让他剪下了商品吊牌，真实的获益者也并不存在，真实的伤害却发生了。网暴受害者即使身在家中，也难以逃离网络带来的痛苦和恐惧。

在“最快女护士”相关报道的评论区，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评论是，“美好的生活应该是很多人都能同时享有”。这种“共情”式的表达，在“乌烟瘴气”的舆论中显得格外珍贵。就像在“吊牌事

件”当事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中，很多网友贴出自己没摘吊牌的玩偶、衣物，帮当事人解释，不摘吊牌并不是为了退货，有人是真的忘了摘，有人把吊牌当作“官方正品”的证明，有人是为了纪念那个送礼物的人。

这更接近正义的模样。柏拉图认为，真正的“正义”是各安其位、各司其职，个人的情感和欲望服从理智的统率，让自己灵魂中较好的部分控制较坏的部分，做到自身秩序井然，进而成为自己的主人。

在“吊牌事件”发生后，销售商品的企业向公众证实了公益寻亲吊牌的真实性，还赠送了当事人一套全新的滑雪服和帽子作为保留吊牌的答谢。商家解释，品牌设立寻亲吊牌的初衷，是希望人们能带着吊牌到达偏僻的山庄和村落，“也许未来3年、5年、10年，真的会有一个小朋友因为这个吊牌找到了回家的路”。

真实是对谣言最好的反击。在当事人的社交账号里，对她“恶语相向”的网友大多销声匿迹，不少拿着“道德大棒”想要展开新一轮“论战”的网友也扑了个空。与其匿名谩骂“惩罚”一个陌生人，不如摘下所谓“正义”的面具，直面自己的道德瑕疵，用行动创造一个人人共享正义的世界。

上一动不动。

10岁的大女儿没穿外套就跑下楼接救护车。6岁的小女儿愣愣地坐在沙发上，看到了整个过程。

120急救电话的接线员问，病人还有没有呼吸。高俊的半张脸压在地上，只露出一半的鼻孔。王飞伸手探了探，说有呼吸。

但急诊入院时的病情显示：到达现场后患者意识丧失，双侧瞳孔散大固定，对光反射消失，颈动脉搏动消失，呼吸音及心音消失。

王飞触到的可能只是丈夫的体温。“是我心里认为他有呼吸。”她小声道。

18点21分，医生正式宣告高俊死亡，死因一栏写着：呼吸心跳骤停综合征。这是一种致命的临床状态，常见的病因之一是急性心梗。

北京安贞医院神经疾病中心主任医师霍晓川在他的科普视频中提到，心脏每跳一次，心肌细胞就会经历一次磨损，正常睡眠时，它能得到40%的修复，缺觉时，修复几乎停滞。“熬夜本身未必会直接导致猝死，但会让猝死风险飙升。”他总结道。

高俊的葬礼上，来了许多人吊唁，和他的遗体告别。那个因观点不合而被拉黑的朋友一大早就来帮着写挽联。小毛从北京开车赶来。

她看到王飞强撑着场面，直到与她拥抱，才在她耳边嚎啕大哭：“咋办啊，我俩妮儿都看见了。”

当王飞后来得知，丈夫的薪酬只有1000元一天时，更感到难以置信。广告导演田春鹏证实，高俊此前拍广告的费用是2-3万元一天（广告拍摄通常在1-2天内完成，前期筹备与后期工作不单独计费——记者注）。

亲友们经过多方打听，终于接受这个事实：在郑州，一个短剧副导演的薪资大约就是如此。

在某招聘平台发布的《2025微短剧从业者生态调查》中，当谈及行业困境，41%的受访者提到了福利待遇低。这与人们对短剧火热的想象并不相符。

开会1天，开拍4天，加上路费报销，刘爱国代表河南花贝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最终付给王飞6000元工资和1万元抚恤金——“这个事儿仿佛是往我心上扎的一把刀。”王飞很难接受。她的工资每月还了房贷剩不下多少，已经停了两个女儿的小提琴课。

她认为丈夫应该得到更多赔偿。但按照现行的工伤保险条例，“认定工伤”的条件之一是“在工作场所内”。“视同工伤”的情形，也要求“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

更重要的是，申请工伤赔偿，要先有劳动关系。但在灵活用工、临时搭班的短剧行业，不签合同的情况普遍存在。

浙江省此前将群众演员等7类人员纳入工伤保险保障范围，用人单位可自愿选择为其单险种参加工伤保险、缴纳工伤保险费，但对剧组其他工作人员，尚未作出规定。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法官陈洁婷曾撰文提到：“剧组只是为了影视项目摄制而在临时组建的机构，就像是去完成一个工程临时组建一个项目部一样，它并不是适格的民事主体，无法对外承担民事责任，最终责任承担的主体，还应该是剧组隶属的出品方”。

陈洁婷认为，“（微短剧行业）演职人员很有可能并非劳动关系，一旦发生身体伤害，无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而且由于缺乏完善的保障机制，演职人员在赔偿方面面临诸多困难。因此，合同中约定由用工方购买商业保险就显得尤为必要”。

刘爱国称，剧组为每位工作人员都购买了商业保险，但只在拍摄期间生效。杀青后，执行导演的工作就结束了。“如果他要接别的项目，不再参与这个项目，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他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高俊猝逝后，一些影视保险公司宣称已将猝死保障纳入了剧组人员险的默认范围——7日内，剧组为每位员工投保11元，如发生因工猝死，将得到10万元赔偿。保费越高，赔偿金额越大。

目前，国家广电总局正在制订“微短剧管理办法”，计划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发布，为微短剧发展提供良好的法治保障。

比起法律的“事后”保障，在健康“报警”之前，“赶紧休息”是来自医生的朴素建议。作为社交媒体的“科普名医”，霍晓川发过数条视频谈及熬夜为何引发“心梗”“脑梗”，有些病例甚至是年轻人。熬夜并且白天高压工作，是会增加猝死风险的重要因素之一。他建议，这时必须立刻停下手中的事，赶紧休息。

“多条释放压力的出口。”霍晓川为他最新的一条科普视频写道。

（应受访者要求，小毛为化名）

# 一名短剧副导演倒在拍摄结束后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佳冰

在同一个短剧组，共事了4个日夜的同事，得知副导演高俊已经死亡的消息时，翻出杀青时的合影，问：“是哪个？”

合影拍摄于10月18日深夜1点57分，在河南郑州，这个剧组刚刚结束一部“出海”短剧的拍摄。照片里的17个人多数面带微笑，包括两位说葡萄牙语的外国演员。

前排右二站着的高俊，两天后在家中突发呼吸心跳骤停去世。

他43岁，个子不高，身形偏胖，笑起来面目和善，穿着一件明黄色的卫衣，在一群年轻的面孔中相当显眼。

这是他第二次进组拍短剧。

## 1

剧组杀青当天的下午3点左右，副导演高俊回到开封的家里，跟妻子嘟囔说脚疼，想去睡一觉。

他放下背包和行李箱，简单跟两个女儿打了招呼，进卫生间洗了把脸，脱下那件黄色卫衣，就进卧室睡了。

妻子王飞回来后回忆，整个过程可能不超过10分钟。她一向很少过问和打扰丈夫的工作，只是帮他关上卧室的门，打开他的行李箱。

这个家庭在建立伊始，就有了明确的分工。高俊早年四处拍纪录片，拿了一些奖项，后来又拍广告，经常出差，行李箱多半是妻子帮忙收拾。

王飞知道这一次丈夫是去拍短剧，但她以为和拍广告没什么不一样。她把高俊每天要吃的降压药从箱子里拿出来，脏衣服丢进了阳台上的洗衣机。

洗衣机对面，是高俊的显示屏和导演椅。这个90平米的两居室空间有限，高俊就在阳台上给自己布置了一块办公区，装上遮阳帘，用绿植和鱼缸隔开。

王飞回忆，她随后接送女儿、熬粥备菜——直至晚饭做好，始终没有进卧室打扰丈夫。

这天上午8点51分，高俊还给发小余珂打了个电话，说自己失眠了。

“你怎么会失眠？”余珂有点纳闷。在他印象里，高俊入睡很快，且鼾声极大。他开玩笑说过，跟高俊一起露营也要扎两个帐篷。

高俊在电话里回他，“熬得累”，压力大。

晚上7点40分左右，王飞做好晚饭，让孩子叫爸爸起床。餐桌边，一家人聊天时，高俊又提到脚疼。

王飞后来才知道，过去4天，丈夫在办公室、卧室、走廊、会议室之类的室内拍摄场景里，走了将近6万步。

但在那个小小租屋的傍晚，高俊没有细说，王飞也没太在意。她记得晚上丈夫处理了一会儿工作，就开始陪女儿练小提琴。

在两个孩子的教育上，这个父亲颇为用心。在大女儿出生的2015年，高俊就查阅河南省当年高考录取的情况，为孩子规划道路。

他的电脑里收藏着孩子们的课表和荣誉证书，工作台的架子上放着家庭相册。其中不少照片是出游时拍的，他们每年都会组织一次家庭旅行。

但今年，高俊的工作前景不明，一家人还没出过游。

杀青归来的第二天午餐时，他们再次聊起了旅游的事情。妻女提出想去珠海，那儿暖和，但高俊想爬山，他是“驴友”。

这次讨论过后，高俊把“长隆海洋王国”放进了手机的收藏夹里。

晚上10点30分左右，一家人休息了。那是高俊和王飞结婚20年来，最后一次在同一张床上入睡。

## 2

第二天早晨7时许，高俊就起床了。一家人吃过早餐，他进入阳台的办公区。按照惯例，在那张1.2米长的桌子上，他会严格规划自己这天要做的事情。

丈夫工作时，王飞要求两个女儿不去打扰，所以家里人不知道高俊那天在忙什么。

今年1月，他在电脑上列下的第一个工作事项是，要给繁塔——河南开封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之一——拍一场雪景镜头。顺便找找有没有愿意为这个项目出资



高俊家客厅的书架上，摆放着一家人的合影。画面正中为高俊，高父几年前已去世。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佳冰/摄



11月8日，王飞停了女儿的小提琴课，女儿仍在家里练习。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佳冰/摄



高俊家客厅的整墙书架上，摆放着高俊的老相机和纪录片奖杯，还有不少关于电影的书。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佳冰/摄

的人。

在郑州全力打造“微短剧之都”之初，高俊考虑的是他家附近这座北宋的佛塔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他自掏腰包，组织起一个团队，要拍纪录片。和朋友交流时，他热忱地说：“我们可能会做出点学术成果。”

他大概也考虑到了纪录片市场价值有限，于是提出与做短视频的朋友杨丰年合作，让他将拍好的纪录片拆条、“切片”，在社交平台上“连更”。

为这周折的制作过程，杨丰年与高俊起过争执，认为他不懂娱乐化。而高俊认为，他要把文化一点一点讲清楚。

“网络平台只是工具而已，我不需要屈服于网络平台，我不可能被网络平台规则驾驭。”他曾向另一位合作伙伴柳超说。

这个项目后来因缺少资金而搁置。高俊对柳超无奈地抱怨：“现在，没人有这个需求，我们希望能服别人有需求，难点在这儿。”

工作不多的时候，他要求自己每天学英语、练吉他、读书，得空给花施肥、搭架子，收拾鱼缸。客厅里有一整面书墙，是2020年搬进来时高俊特意设计的。他喜欢读书。

这几年，高俊作为传统广告导演的工作空间也在受到挤压。《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5）》佐证了这一点——传统媒体广告正在大幅下滑。

投放至互联网平台的广告项目被拆解得更零碎，精准投放给社交媒体、短视频博主制作，还有AI的冲击。4月4日，高俊在工作计划里多次提到，要了解AI视频技术软件、AR眼镜的技术内容。

去年，据杨丰年了解，高俊还接过一部宣传片和一两支广告。今年似乎一个活儿也没接到。

此前，高俊曾为难地向余珂透露，自己的存款掉到了10万元以下，还借给朋友一些。两个女儿学琴，每月要支出3800多元。

姐妹俩住同一个房间，姐姐在卧室练琴，妹妹在客厅练琴。高俊还想换一套大点的房子。但这套房子的贷款还没还完。

4月16日，好友小毛到河南周州观摩了一个短剧组后，经过开封，约高俊夫妇一起在夜市吃饭，讲起了剧组的见闻，说熬夜很多。

在饭桌上，高俊还追问她，是怎么熬。

“几乎都不睡觉。”小毛说。

那段时间，高俊正关注自己的健康问题，连续多日在电脑上记录体重，列出运动目标：游泳、俯卧撑。但体重始终在83公斤左右浮动。他身高1.7米，还是偏胖。

多位好友回忆，患上高血压的高俊很



高俊几年前的工作照。



高俊的女儿拿着她的乐谱和画作，此前她在学习这两门兴趣课程。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佳冰/摄

少再喝酒。哪怕纪录片找出资方，需要应酬，他也是推辞说要开车。

到了5月，王飞记得，丈夫突然问她看不看短剧。她说不看，觉得剧情夸张，不符合逻辑，她不喜欢。

但5月7日，高俊还是在电脑里写下了新的工作目标：“向短剧方面探索”。

之后，他把搭建纪录片工作群的群主转给了朋友，说自己可能要忙一段时间。“变化中求生存。”他向柳超说。

## 3

决定拍短剧之后，高俊下载了一个短剧App，浏览了300多部剧，完整看完了7部。

他找到一家郑州的短剧公司跟组观摩。当时的工作节奏是“10天拍4部”，他认真写下对短剧的理解：“理解为大数据工作的本质”“理解时间与产出效率比的取舍概念”“理解内容比画面更为重要”。

在观摩笔记中，他提示自己：“身体健康：不再有16小时或14小时概念（指传统广告行业的一日工时，超时工作将单独计费——记者注），这会有更多风险。”最后，他写下：“入局，不能被时代抛弃，寻求改变机会。”

在短剧的“时代”，高俊实际上已经晚了一步。观摩结束后，整整一个月，他都在等一个实操的机会。一家短剧公司向向他解释道：“现在新导演都是排队报到。”比起两年前，郑州的微短剧从业人员至少增长了5倍，已有近4万人。

7月1日，高俊联系此前相识的短剧导演刘爱国：“有什么工作机会别忘了兄弟，兄弟我要找工作”。

刘爱国自2023年起就在拍出海短剧。高俊曾在工作日志里提示自己：“海外市场没有国内市场这么卷，可能是个机会。”

“需要执行导演不？”9月25日，高俊再次问刘爱国，他们终于确定了合作，要拍摄一部出海巴西的短剧。剧本已经定好，改编自国内一部爆款短剧，共50多集，计划4天拍完，一个多月后上线。

面对这个机会，高俊竭尽所能地准备。刘爱国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当时高俊没有问过他有关薪资待遇的问题。

高俊从没见过巴西，也不懂葡萄牙语，就结合剧情在网上研究，巴西的黑帮混混是什么样，富豪又是什么形象。他给每个角色挑选了适合的着装风格，并附上服装的品牌和图片。

拿到剧本后，他提出许多异议：“中国

式的浪漫，符合巴西文化吗？”“生鱼片过敏可否换成其他过敏原因？毕竟巴西靠海。”

为一场咖啡店的戏份，他找到13家巴西咖啡店的实景图，又在郑州选出与之风格相似的3家店，作为拍摄场景备选。

但制作团队出于成本和效率的考虑，还是定在摄影基地拍。为了布景的真实性，他把家里的咖啡机带到片场。

这符合他一贯的做事风格。2005年，职专毕业的高俊在开封一家商场里卖摄影设备，爱上影视行业后，自己攒钱到中国传媒大学进修。

当时的同桌小毛，评价他认真到了几乎较真的地步。“我是得过且过的人，他是认真理解的。”她说。

他会给一家酒店分4条、写下730字的投诉建议；曾因为和朋友争论国际问题而拉黑了对方。杨丰年用开封话形容他，“二细”，意为过分细致，有时超出了必要。

这性格使他做成了一些事情。在中国传媒大学进修结束后，他得到机会参与“中国载人航天”“一带一路”等题材的国家级纪录片项目，跑过许多地方。由他担任制片人的两部短片，还曾获ISF2022洛杉矶电影节、2023柏林国际艺术电影节等奖项。

妻子了解高俊：“他希望自己的拍的东西，除了别人满意，自己也要满意。”

10月14日早上6时许，出海短剧开机当日，高俊驾车驶向“微短剧之都”郑州。他在路上拍了一张照片，车前大雾弥漫。

此后几天，高俊都没有和家里联系。直到第四天，才发来一条信息。“今天拍完。会拍很晚。”

## 4

丈夫去世后，王飞经历过两次悲愤交加的时刻。

第一次是她从高俊的工作群聊中，才理解他所说的“晚”——几乎是每天半夜2点收工，早上7点开工。

在这之前，她以为丈夫的死只是无常的厄运。当知道网上有人传“郑州短剧行业有人累死了”，她的第一反应是气愤：“为啥要这样说？”

8月，高俊已有过一次短剧拍摄经历，并且是在10天内拍了4部。不同的是，根据高俊的工作记录，当时只有两天是超过半夜12点收工的。

同剧组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他跑过的短剧组中，这一次的工作强度是中等水平。但对入行不久的高俊而言，仍是前所未有的体验。



最后一部短剧拍摄期间，高俊作为执行导演，在片场给演员讲戏。  
受访者供图



高俊在家中阳台为自己布置的办公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佳冰/摄

开拍第二天，深夜1点43分的消费记录显示，他花10元买了一份“福鼎肉片”。

第三天“搞到凌晨两点”，他发信息跟朋友开玩笑：“雨夜在室外，快死了”。

杀青当晚，半夜3时许，他还没有睡。余珂记得，在高俊早上打来的那通电话里，他提到了因语言不通造成的工作障碍与压力。

4天的拍摄时长，与甲方的投资金额、剧本集数、戏份难度、演员档期等多种因素相关，是通过严格的成本核算定下来的。作为制作公司，这是必须要算的一笔账。

短剧行业市场规模庞大，但利润在产业链各环节的分配并不均衡——制作方为小，播出平台为大。据刘爱国了解，目前郑州的短剧公司大多是制作公司。

如果制作方与平台合作出品，就能参与分成。但如果只是根据平台要求完成制作，收取制作费，就只能通过严控成本来赚取利润——核算不当，就可能亏本。

刘爱国说，他的项目就是如此。作品上线后，即便流量可观，收益也与制作团队无关，良好的数据只是能为他们带来更多合作的机会。

杀青回家后，高俊的最后一个夜晚是在阳台的工作桌前度过的。为避免打扰妻女休息，他把客厅的帘子拉了起来。

第二天一早，大女儿看见爸爸躺在沙发上，没回卧室里睡。

当天中午，高俊给刘爱国发去几张剧照。这是杀青之后双方第一次交流。

“抱歉，这次做得不好，出乎自己意料……失误不断，估计前面睡得也不太够，从未有过的片场断线感觉。”高俊说，“无论怎么说，自己难逃责任，内心十分愧疚，辜负了刘导好意。”

刘爱国安慰了他几句。高俊主动提出要订后期。“随时等候任务指令。”他发了个努力的表情。

差不多的时间，王飞给丈夫打了一通电话，让他中午自己弄饭吃。

两个女儿都在学校，她单位离家远，中午不回来。挂掉电话之前，她叮嘱高俊把冰箱里的牛肉拿出来解冻，晚上她回来炒菜吃。

高俊照做了，把肉放在厨房台面上给妻子拍了张照。

下午4点40分左右，王飞接上两个孩子放学回家。一进家门，女儿习惯性地喊：“爸爸，我们回来了。”

没有人回应。那天开封下着小雨，天色昏暗。王飞发现客厅的灯开着，卫生间的门开着，灯也开着。她走过去，发现高俊趴在地